

略论我国传统核心价值观“仁义礼智信”的发展轨迹

戴木才

(清华大学 高校德育研究中心, 北京 100084)

摘要:我国是世界上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具有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在我国五千多年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伴随传统道德的产生、形成和演变,逐渐形成了“仁义礼智信”的传统核心价值观。“仁义礼智信”作为我国传统价值观念的总纲和根本,牵动、影响和辐射着我国传统社会的价值观念体系和道德规范体系,推动着我国传统社会思想道德的教化与进步。“仁义礼智信”这五个核心价值理念与我国传统道德的发展、演变相联系,也经历了一个形成、发展和不断完善的演变过程,它对于确定中华民族文化发展路向、锤炼民族性格、培育民族精神起到了重要历史作用。

关键词:核心价值观;传统;仁义礼智信;发展轨迹

中图分类号: K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365(2018)03-0001-07

在我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的生存、延续和发展,积淀了深厚的思想文化根基,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核心价值观和优秀道德精神。我国传统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旗帜。一般认为,随着我国古代自然经济和封建君主专制政治的逐步发展,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汉武帝采纳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治国之策,在东汉公元79年的白虎观会议上被正式确定为我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仁(通义)礼(通智)信五常之道”,是我国传统的核心价值观。这一传统核心价值观,是我国古代思想界归纳的五个核心价值理念,其由来和发展经历了一个产生、形成和不断完善、发展与嬗变的过程。

一、“仁义礼智信”的提出与确立

自有文字记载以来至春秋时期,是“仁义礼智信”五个德目被分别提出和确立的阶段。

“仁”的提出,最初与氏族宗族血缘关系相连,主要是指同情、关心和爱护,其完整思想首先是由孔子阐释和传播的。

“义”最初的含义,既指仪表和风貌,也指适宜和正当,后来泛指一切道义,其作用是维持社会秩序。

“礼”最初是原始社会祭神祈福的一种宗教仪式,经过儒家的改造,其内容由单纯的习俗仪式发展成规范婚姻、血统、长幼、尊卑等关系的行为准则,并逐渐制度化、法律化。

“智”最初是指人们对事物的判断迅速准确,后来被春秋时期的儒家赋予明辨是非善恶、自知知人等道德内涵,予以倡导。

“信”最初是指祭祀上天和先祖时诚实不欺、不敢妄言,后来逐渐摆脱其宗教色彩,特别是经过春秋时期儒家学者的倡导,成为一项重要的社会道德规范。

二、“仁义礼智”四德整体的提出

首先把“仁义礼智”四德作为一个整体提出出来的是战国时期思想家孟子。在《孟子》一书中,“仁义礼智”四德作为一个整体提出,共出现两次。

一是《告子上》,其文云: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今日‘性善’,然则彼皆非与?”

收稿日期:2018-03-12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清华大学高校德育研究中心)重大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17JJD710001);清华大学自主科研计划文科领军人才支持专项(W04)“中华传统核心价值观的创新性发展研究”(2017THZWLJ01)。

作者简介:戴木才,男,江西吉安人,清华大学高校德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孟子曰：“乃若其情，则可以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诗》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孟子提出“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这一命题，意思是说，“仁义礼智”不是外界给予我的。这是孟子“人性善”观点的体现。“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滕文公上》）他认为，人与人、人与生俱来便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这四心乃是“仁义礼智”的发端和萌芽，将其扩充和完善，便是“仁义礼智”四德。孟子充分肯定了“仁义礼智”是人内在的自觉道德意识，反映了孟子的天赋道德观。

二是《尽心上》，其文云：

孟子曰：“广土众民，君子欲之，所乐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乐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晬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

孟子提出“仁义礼智根于心”的看法，是为了奠定性善论的理论基础，借以肯定其“仁义礼智”四德整体源于人的内在的自觉道德意识。同时，孟子又提出“仁义忠信”四德一体，称“仁义忠信”为“天爵”，而称“富贵利达”为“人爵”。他认为，“仁义忠信”是人生而具有的美德，是人生命中最有价值的东西。他要求人们“反求诸己”，孜孜不倦地修养“仁义忠信”之美德，反对当时的人修德以求“富贵利达”，而后抛弃“仁义忠信”的行为。

在提出“仁义礼智”与“仁义忠信”四德整体德目的同时，孟子还提出了“孝悌忠信”四德整体德目，要求人们“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孟子·梁惠王上》）。

三、“礼义廉耻”四维德目的提出

管子，即管仲（公元前 719—公元前 645 年），名夷吾，字仲，春秋初期齐国主政之卿，政治家、军

事谋略家。《管子》一书相传为管仲所撰，实际上系后人摘录管仲的言行及稷下学派言论并大量附以齐国法家著作汇编而成。

管子提出了“仓廩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著名论断。同时，他首次提出了“礼义廉耻”四维德目，坚定地将“礼义廉耻”视为治理国家的四大伦纲，认为教化人民懂得“礼义廉耻”是促进社会和谐的巨大力量。他说：

四维张则君令行……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得覆。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管子·牧民》）。

四、“仁义礼智圣”五行德目的提出

1973 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帛书《五行》，学术界认为这是失传了的孟子的五行学说，即孟子关于五种德行的学说。这五种德行，就是“仁义礼智圣”。

1993 年，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在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村战国楚墓出土的竹书中再次被发现。郭店楚简《五行》已经有了构建和谐人心、和谐人生、和谐社会的思想因素。

郭店楚简《五行》的主题，是通过德与善的探索，试图建构一种将五种社会道德规范（即“仁、义、礼、智、圣”）内化为人们的品德信念（即“五行型于内”），以及将人们的品德信念外化为具体的品德行为的道德体验模式；认为圣人既能闻君子道、洞识君子道，将君子道内化为品德信念，又能将君子道外化为品德行为；圣人能将天道、人道、君子道集于一身，探索美德、追求美德、造就美德。

君子乃是“和则同，同则善”的集人道之大成的“善”的探索追求者，是追求五行和谐的“善”的境界的智者。

郭店楚简《五行》，开宗明义便写道：

五行：仁型于内谓之德之行，
不型于内谓之之行；
义型于内谓之德之行，
不型于内谓之之行；
礼型于内谓之德之行，
不型于内谓之之行；
智型于内谓之德之行，
不型于内谓之之行；
圣型于内谓之德之行，

不型于内谓之行。

这一批楚简大约写定于公元前330年左右。这一“仁义礼智圣”的五行伦理体系,学术界将其确定为思孟学派的著作,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中得到了发展。其中“圣”德在传世的《孟子》中被视为最高的道德境界。

在《孟子》中,“圣”字出现47次。如:“由汤至于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公孙丑上》);“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乎。’”(《公孙丑上》)可见,圣德在儒家眼中的地位非常崇高。

与郭店楚简《五行》同时出土的还有《六德》。“六德”之说,源自《周礼·司徒》。《周礼·司徒》的“六德”是指知、仁、圣、义、中、和。郭店楚简中的“六德”则是指圣、智、仁、宜、忠、信。宜,即“义”也。《六德》指出:

父圣,子仁,夫智,妇信,君宜(义),臣忠。
圣生仁,智率信,宜(义)使忠。

故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六者各行其职。

这是说,父亲要像个父亲,父亲必须恪守父亲的圣德;儿子要像个儿子,儿子必须恪守儿子的仁德;丈夫要像个丈夫,丈夫必须恪守丈夫的智德;妻子要像个妻子,妻子必须恪守妻子的信德;君王要像个君王,君王必须恪守君王的义德;朝臣要像个朝臣,朝臣必须恪守朝臣的忠德。

敦煌文书中,有一件《孝经注》残片,其于“卿大夫章第四”之“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句下注云:

古者六德之行:仁、义、礼、智、忠、信,是为六德。好生恶死曰仁;临财不欲,有难相济曰义;尊卑慎序曰礼;智深识远曰智;平直不移曰忠;信义可复曰信。

这就将战国竹书《六德》的具体道德规范上升到了一般的道德规范。

五、“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的确立

“仁谊礼知信”合起来称作“五常之道”的文献记载,最早出现在董仲舒《举贤良对策》中。董仲舒首先是从立教化、正万民的角度提出“仁谊礼知信”的。

《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写道:

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势,又有能致之资,行高而恩厚,知明

而意美,爱民而好士,可谓谊主矣。然而天地未应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圣王之继乱世也,埽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诗》云:“宜民宜人,受禄于人。”为政而宜于民者,固当受禄于天。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晷,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

这是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仁谊(义)礼知(智)信五常之道”的文献记载。董仲舒把《尚书·泰誓》的“五常”(唐孔颖达云:“五常即五典,谓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者人之常行。”)一词,同孟子的“仁义礼智”“孝悌忠信”“仁义忠信”进行综合创新,提出了“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这一整体德目,强调修饬仁谊(义)礼知(智)信五常之道,以推行教化、美善习俗、醇正民风(《全汉文·举贤良对策》)。

“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乃是个人处理人际关系的五种最基本和最起码的道德要求和道德意识。

仁、义、礼、智、信这五个具体德目,虽然早已提出,但把它们作为整体道德要求概括为“五常之道”,则是董仲舒第一次从诸多的道德规范中总结提出来的。他将“仁谊礼知信”概括为永恒的道德规范。

六、“仁义礼智信”整体德目的确定

官方确定“仁义礼智信”作为“五常”这一整体德目,是在董仲舒去世183年后(汉建初四年即79年)的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的会议上,其会议纪要为《白虎议奏》(《后汉书·章帝纪》)。《白虎议奏》已亡佚。

会后,班固奉命整理讲议记录,编辑成《白虎通德论》。其文云:

五常者何?谓仁、义、礼、智、信也。仁者、不忍也,施生爱人也。义者、宜也,断决得中也。礼者、履也,履道成文也。智者、知也,独见前闻,

不惑于事,见微者也。信者,诚也,专一不移也。故人生而应八卦之体,得五气以为常,仁、义、礼、智、信是也。(《白虎通德论·情性》)

这不仅将“五常”正式确定为“仁、义、礼、智、信”,而且对每个具体德目进行了明确规定。

东汉郑玄(公元127—200年)笺《毛诗》:

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烝,众。物,事。则,法。彝,常。懿,美也。笺云:秉,执也。天之生众民,其性有物象,谓五行仁、义、礼、智、信也;其情有所法,谓喜、怒、哀、乐、好、恶也。然而民所执持有常道,莫不好有美德之人。(《毛诗注疏·烝民》)

郑氏没有将“仁义礼智信”称作“五常”,而称之为“五行”,盖源于郭店楚简《五行》的缘故。

魏晋至清代中叶,是“仁义礼智信”不断扩大影响并有所发展的阶段。魏晋隋唐时期,“仁义礼智信”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得到大力倡导,逐渐成为人们普遍认可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宋明清时期,儒家学者进一步从理论上对“仁义礼智信”加以阐发,从而使仁义礼智信整体德目得到不断发展。

七、周敦颐的“诚,五常之本”说

宋明理学的开山祖师周敦颐(公元1016—1073年),在建立他的“以诚为本”的道德本体论的同时,发展了“仁义礼智信”这一整体道德体系。他说:

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五常,仁、义、礼、智、信,五行之性也。百行,孝、弟、忠、信之属,万物之象也。实理全,则五常不亏,而百行修矣。静而无动有,至正而明达也。……五常百行,非诚,非也,邪暗,塞也。非诚,则五常百行皆无其实,所谓不诚无物者也。静而不正,故邪;动而不明、不达,故暗且塞。故诚则无事矣。(《通书·诚下》)

就是说,“诚”是“仁义礼智信”五常的根本,是一切有关伦理行为的源泉。

在此,周敦颐已经将“诚”发展到了做人的最起码、最基础、最根本的道德准则和要求,为“仁义礼智信”五常及其实践(百行)探寻一个得以俱存的本体,也可以说是一种道德本体论的观点。

实际上,这个作为“五常之本”“百行之源”的“诚”,就是做人的基本信念和起码要求的对象化、具体化。

周敦颐将以往的“五常”归结到一个本源——“诚”,要求人们必须诚仁、诚义、诚礼、诚智、诚信。这就将“仁义礼智信”真正整合成了一个整体道德体系。如何才能做到“诚”?周敦颐明确指出:“无妄,则诚矣。”(《通书·家人睽复无妄》)

八、二程的“五常全体四支”说

仁义礼智信整体德目,在宋明理学伦理思想的奠基人程颢(公元1032—1085年)、程颐(公元1033—1107年)那里,发展成为“五常全体四支”说。他们由天人“一理”的道德本体论推演到人性论,提出了“理、性、命,一而已”(《二程外书》十一)。也就是说,“性即是理”(《二程遗书》卷十八)。

既然“性即是理”,而“天理”“具备万理”,包含了普遍道德的各个条目,所以说“性无不善”(《二程遗书》卷十八)。因而,他们将“仁义礼智信”发展成为“五常全体四支”说。

仁、义、礼、智、信五者,性也。

仁者,全体;四者,四支。

仁,体也;义,宜也;礼,别也;智,知也;信,实也。(《二程遗书》卷二上)

将“仁、义、礼、智、信”归结为“性”,揭示了“性”具有本然的“善”(即“理”)的内在德性结构,而以“仁性”为“全体”,“义性”“礼性”“智性”“信性”为“四支”(“支”通“肢”),并指出仁为性之体、义为性之宜、礼为性之别、智为性之知、信为性之实,则清楚地阐明了五者之间的内在道德关系和逻辑结构。

九、朱熹“五常之性”即“五行之理”

朱熹在继承二程“五常全体四支说”的基础上,提出了“五常之性”,即“五行之理”。他说:

盖人之性皆出于天,而天之气化必以五行为用。故“仁、义、礼、智、信”之性,即水、火、金、木、土之理也。木仁、金义、火礼、水智各有所主,独“土”无位而为四行之实,故“信”亦无位而为四德之实也。(《晦庵集》卷五十六)

天地之帅则天地之心,而理在其间也。五行,谓金、木、水、火、土尔。各一其性,则为仁、义、礼、智、信之理。而五行各专其一,人则兼备此性而无不善,及其感动,则中节者为善,不中节者为不善也。(《晦庵集》卷五十八)

性之所以为体,只是仁、义、礼、智、信五字,天下道理不出于此……五者之中,所谓性者是个真实无妄底道理,如仁、义、礼、智,皆真实而无妄者也。故信字更不须说,只仁、义、礼、

智四字于中各有分别,不可不辨。盖仁则是个温和慈爱底道理,义则是个断制裁割底道理,礼则是个恭敬撙节底道理,智则是个分别是非底道理。凡此四者具于人心,乃是性之本体……仁字是个生底意思,通贯周流于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体也,义则仁之断制也,礼则仁之节文也,智则仁之分别也。(《晦庵集》卷七十四)

朱熹将“五常”与“五行”、“五常之性”与“五行之理”的关系揭示出来之后,最后将天下道理归结为全出于“性之所以为体,只是‘仁、义、礼、智、信’五字”,要求人们以仁爱为本,恪守做人的根本道理,努力实践“仁、义、礼、智、信”五常伦理,做真正的圣贤君子。

朱熹不仅继承了二程的“五常全体四支说”,而且还提出了“仁包四德”“百行万善总于五常,五常又总于仁”“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认为这是做人的基本品德,被后人称为“朱子八德”。此后,王守仁、王夫之等人也对仁义礼智信的有关德目作出了新的解释。

十、中国传统核心价值观的近代嬗变

自1840年以来,我国逐渐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华民族从此面临着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实现国家强盛、人民富裕的两大历史任务。

外国侵略者的炮声,清政府的没落腐朽、不堪一击和屡遭失败,唤醒了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一些开明的思想家,不仅从经济、技术层面寻找中华民族贫穷落后挨打的原因,同时也从价值观念、道德精神和思想文化等层面,去寻找中华民族贫穷落后挨打的原因。他们寻找先进的理论,比较与中华民族不同的思想价值观念,给中华民族的传统核心价值观注入新的时代要求,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价值观念,逐渐开始酝酿、形成和发展。

一方面,晚清封建统治阶级极力维护封建纲常名教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中的进步分子,运用传播进来的西方近现代思想价值观念,对封建纲常名教进行猛烈抨击。他们吸收近代以来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价值观念,建立新的核心价值观和核心价值体系,认为人人都有天赋的自然权利,大家都是平等的,要打破封建宗法等级制度,无所谓大人、小人。在他们看来,人人都是生而自由的,这是人们相爱、相助的人

性基础。他们主张确保人权、平等、独立,建立一个没有不平等现象、至治至仁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大同世界;“开民智”“新民德”,以科学文化和资产阶级思想道德改变国民性。

维新志士谭嗣同虽然把传统的“仁道”作为根本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却赋予它完全不同的新内容。他认为,“仁”是天地万物的本源,是宇宙的普遍规律,但他说的“仁”已加入了新兴资产阶级思想价值观念的内容,把资产阶级的商业活动看作是最“仁道”的行为,与“五常”之一的“仁”有很大区别,已经具有平等、博爱的内涵。他把“仁”看作“通”,认为“上下通、中外通、人我通、男女内外通”,就是“相仁之道”。

宣传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先驱严复,大力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民权思想,提倡尊今叛古、尊民叛君,把片面强调“仁义”而否定“功利”的思想价值观念看作是阻碍社会进步、祸害天下“仁义”的浅薄之道,认为只有“义利合一”的价值观,才是最合乎人类长久真实之利的最“仁义”、最道德的行为。

梁启超则把中国的旧道德与西方的新道德作比较,并在此基础上对旧的封建道德,尤其是对束身寡过和存心养性的道德修养方法进行猛烈批判,认为我国传统的道德修养方法偏重于私德而缺乏公德,注重的只是一私人为一私人的事,而西方的思想道德观念更重视社会伦理和国家伦理。他认为,应该把私德和公德有机地结合起来,据此塑造新国民,建立新国家。

在近代重新诠释我国传统核心价值观的潮流中,民族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孙中山、章太炎是走在最前列、最典型的代表。

孙中山、章太炎对孔孟的“仁学”思想给予了新的解释,强调要发扬救世之仁、救国之仁。他们将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加进中国传统的“仁德”思想中,对传统的“仁德”观念进行了扬弃式的继承。

他们以西方资产阶级的核心价值观——“自由、平等、博爱”为旗帜,猛烈批判封建旧道德,提出“道德革命”“三纲革命”“家庭革命”,认为要革封建道德的命,首先必须打倒孔圣人的权威,提倡“民权主义”,使人民享受平等和自由的幸福;提倡“民族主义”,反抗异族和帝国主义的压迫,为国家争自由;提倡“民生主义”,要求经济平等、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发展国家资本,实行博爱,图谋民众之幸福。

孙中山深刻地认识到,“大凡一个国家所以能够强盛的原故,起初的时候都是由武力的发展,继之以种种文化的发扬,便能成功”^[1],非常强调中华民族“固有的道德和智能”。他认为,“因为我们民族的道德高尚,故国家虽亡,民族还能够存在,并且有力量能够同化外来民族”^[2]。要复兴中华民族的地位,穷本极源,“除了大家联合起来做成一个国族团体以外,就要把固有的旧道德先恢复起来。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图恢复”^[3]。他认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核心价值观,不是为封建制度所专有的,应该对之加以改进,作出新解释,赋予其以新的时代内涵。他提倡确立忠于国家、忠于人民的新道德,认为无道德便不能革命,人人不具有好人格便不能造成一个好国家;革命党人要具备知耻、重厚、耿介、必信,不求做大官、只想做大事等好的品质。

更为可贵的是,孙中山还对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观进行了高度概括和改造,并赋予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内容,使之成为“三民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提出“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作为中华民国的核心价值观,以期恢复中华民族“固有的精神”。同时,他还提出,中华民族“固有的智能”,即人生对于国家的观念——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应该恢复起来”。他认为,中国政治落后是因为受外国的政治经济压迫,而推究其根本原因,还是由于中国人不讲修身,告诫国人要注意自身的思想道德修养。

孙中山提出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作为中华民国时期的核心价值观,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核心价值观,充分发挥了中华民族“固有的道德”的积极意义,为深入挖掘我国传统核心价值观中的优秀价值元素提供了有益借鉴,具有重要启迪意义。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前后,由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李大钊等一些受过西方教育(当时称为新式教育)的先进知识分子发起了一次“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新、文学革命运动,称为“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旧称“德先生”与“赛先生”,“德先生”指“Democracy——民主”,“赛先生”指“Science——科学”)的旗帜(“民主”是指民主思想和民主政治,“科学”主要指近代自然科学法则和科学精神),宣

扬民主,反对封建专制,把斗争矛头直指封建专制的理论支柱——我国传统儒家思想;宣扬科学,反对封建迷信和愚昧。

新文化运动的“四个提倡、四个反对”等基本内容,真正体现出新文化运动的“新”之所在。它包括: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新文化运动的出现,既是当时特定历史时期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诸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也是近代中国经历长期的物质、思想准备的必然结果。提倡“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反映了我国社会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的迫切需要,有力地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民主”与“科学”,可以看作是“五四”运动前后我国当时的核心价值观。

尽管新文化运动属于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的性质,有其阶级和时代局限性,不能同群众运动相结合,不能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待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因而不能从根本上推翻封建思想。但是,它沉重打击了统治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礼教,启发了人们的民主觉悟,推动了现代科学的发展,使中国许多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还造成了新思想、新理论广泛传播的大好机遇,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传播和“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奠定了思想基础。

民国廿三年(1934年),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发动“新生活”运动,确立了“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的地位,并对其作了如下解释:“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楚楚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在抗日战争时期,“礼义廉耻”又被赋予新的内涵:“礼是严严整整的纪律,义是慷慨慷慨的牺牲,廉是实实在在的节约,耻是轰轰烈烈的奋斗。”“四维”和“八德”,即“礼义廉耻”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被列为“新生活”运动所倡导的国民道德的两大主题。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缺乏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无论是孙中山提出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核心价值观和中华民国政府开展的“新生活运动”,还是“五四”运动前后提出的“科学”与“民主”,对我国传统核心价值观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和封建主义专制政治统治的实质,都不可能做出科学的辨析和彻底的批判,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是简单化的,甚至还出现了对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沿袭和妥

协。同时,尽管孙中山先生和“新文化运动”提出的“科学”与“民主”也力图把我国传统核心价值观融入世界文明发展的时代潮流,但由于民族资产阶级思想的局限性和对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机械理解,尤其是没有与当时最先进的社会主义思想及其时代潮流结合起来,因而不可能站上人类社会

文明发展的制高点,最终没有在中国大地生根、开花、结果。

参考文献:

[1][2][3]孙中山全集:第9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242,243,243.

[责任编辑 汤凌云]

On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ore Values: "Ren (Benevolence), Yi (Justice), Li (Propriety), Zhi (Wisdom) and Xin (Credit)"

DAI Mucai

(Research Center for College Moral Education,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China, with its long history and splendid culture, is one of the earliest civilizations in the world. I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five thousand years, with the emergence, formation and evolve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orality, the traditional core values of "Ren (Benevolence), Yi (Justice), Li (Propriety), Zhi (Wisdom) and Xin (Credit)" gradually came into being. As the general principle and basis, "Ren Yi Li Zhi Xin" influence and shape the value and moral system of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drive the propagation and progres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orality, and promote the morality and civil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The five core valu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directing Chinese cultural development, forging our national character and cultivating our national spirit. Along with the evolu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orality, "Ren Yi Li Zhi Xin", as traditional Chinese core values, also experiences the process of formation, development and perfection.

Key words: core values; tradition; Ren (Benevolence); "Yi (Justice), Li (Propriety); Zhi (Wisdom) and Xin (Credit)"; evolution